

1994

中山文史

第44辑

(运动和人物专辑)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山文史

第44辑

(运动和人物专辑)

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

序 言

市政协主席 苏松勤

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自1992年发出关于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公告以来,已历整整八个春秋。感谢文史委和广大文史工作者所作的努力,以反映中山建国后重大运动为主要题材的《中山文史》第44辑终于面世。

客观地说,就篇幅而言,该书比以前出版的《中山文史》各辑并不显眼,充其量只属于中小型制作。但从其题材及内涵来看,其领域之新,预期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之大,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该辑史料中,有关政治运动方面的,多是人们过去有所顾忌的“禁区”,而该书的作者,毕竟以“首吃螃蟹”的胆色,将“禁区”闯了。尽管不存在什么禁区,但他们果敢地走出误区,以高度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无畏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对于建国后这段极其辉煌而又不平凡的历史,正史早有定论。但文史是正史的补充,能从广

泛和深层领域,以具体的“三亲”史料,如实地、全面地、本质地反映历史。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亲历、亲见、亲闻这段历史的人至今多已进入“知命”、“耳顺”和“古稀”之年,部分甚至经已作古。而后一辈的青年人,对于诸如“大跃进”、“四清”、“文革”、“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当年发生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在中山地方的具体演现,却显得是那样陌生,认识近似懵然。因此,如果不把握时机,将这些快要“烂在肚子里”的大量珍贵史料抢救出来,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成书,那么,这段曾令世界震撼的历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所起的警醒和启迪作用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让逝去的历史教训以类似的方式重演,使本来可以顺利发展的未来世界受到损害。现在值得高兴的是,孙中山故乡的一批先知先觉者在这方面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为了再现建国后的历史,他们摒弃杂念,潜心对“三亲”史事作真实的记录。有些同志甚至不顾老弱之躯,呕心沥血于著作之中,这就是对后辈负责的好榜样。《中山文史》第44辑的出版,既是对建国后史料选辑工作的一次尝试,亦是对作者辛勤劳动的一种回报。

建国后的历史岁月悠长,内涵深远博大,史料极之丰富。文史资料工作,应当坚持统一战线和

“三亲”的特点,发挥其“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中山文史》第44辑一书已作了抛砖引玉的尝试。但愿有志于文史写作的热心人士以不懈的努力,撰著更多有历史价值的佳作,以飨读者。

1999年6月2日

目 录

· 运 动 纪 实 ·

“大跃进”的宣传热	赵崧材(1)
大公社的生产运动	林社业(13)
“大跃进”的小故事	闲 叟(45)
我经历的“四清”运动	高民川(51)
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高民川(60)
“文革”风烟	李国瑞(95)
中山教育战线的一场大灾难	容 晖(138)
中山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容 晖(144)
激荡中的“平静”	
——“文革”中的孙中山故居和我的经历	李伯新(155)
我市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	赵崧材(171)

· 人 物 事 迹 ·

基层干部的光辉典范

——前永宁大队党总支书记李汉章的创业事迹	
.....	林社业(177)
缅怀梁其颖同志	赵荣芳(197)
回忆往事,寄托哀思	
——悼念甘子源同志	黎汉铿(211)
甘子源同志二三事	李 浩(219)
对陈振光同志的一些回忆	陈占勤(222)

“大跃进”的宣传热

赵崧材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中山县的新闻和整个宣传工作与全国传媒界一样，成为全民“大跃进”的鼓风机。对曾经泛滥一时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宣传，可说不遗余力，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宣传热。现在，让我们回顾当年全县特别是《中山报》注宣传“大跃进”和宣传界本身“大跃进”的情形，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一、大力宣传脱离现实的高速度和高指标，推广无实践依据的“先进经验”，助长瞎指挥风。

“大跃进”伊始，宣传开道。执着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宣传，使各行业的生产规划、计划一改再改、指标越定越高，最后成为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年初，中山县在贯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楼据中共佛山地委的要求，定出了“三千”、“八变”的规划。“三千”是：每亩年产粮1000斤，每人年有粮1000斤，每户年收入1000元。“八变”是：万顷良田变谷仓，水网河涌变鱼塘，绿化荒山变果山，千里海

注：原名《中山农民报》，后改为《中山报》，1958年7月1日起改称《中山日报》。

洋变渔港，桑蔗基塘变宝地，电器机械代人忙，农村变作花园样，文明富足“四无”注乡。初时，《中山报》宣传这个规划时，提出争取三年实现“三千”，七年实现“八变”，跟着，改宣传为三年实现“三千”，五年实现“八变”。到了5月15日，在宣传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再加速为两年实现“三千”，三年实现“八变”。

除报纸宣传外，宣传界还运用各种形式和工具广泛宣传“三千”、“八变”规划。使“三千”、“八变”的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以致后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它竟成为一则政治笑话：有人形容政策和计划多变时，就挖苦说：真是“三千”、“八变”！

宣传多年规划赶形势，宣传当年的生产计划更是日新月异。例如，在5月15日前，县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仍重申年初制定的全县实现粮食年均亩产800斤的计划；五月下旬后，就变为实现晚造粮食亩产800斤、全年1200斤；到7月23日，当县委书记谭桂明参现了外地“大跃进”经验回来，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形势报告”后，气氛骤热，温度急升，当场把晚造亩产800斤的计划，一下子调升为2000斤。对此，《中山日报》又是刊登消息，又是配发社论，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总之，随着“大跃进”气温不断上升，规划、计划中的生

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31条提到：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四无”即指此。

产指标越定越高；完成规划、计划的时间要求一再提前；而宣传工作也热上加热。那时候，宣传规划、计划指标变动之频繁，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为了贯彻执行“大跃进”的规划、计划，于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强制推行一些脱离实际的生产措施和毫无依据的“发明创举”，助长了瞎指挥风。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宣传高度密植，认为越密越好，搞什么“满天星斗”、“蚂蚁出洞”。例如：7月4日报道《让“蚂蚁出洞”大显身手——五圩乡推广 6×2 、 6×1.5 插秧规格》。8月2日报道阜沙乡《东罟社田头会诊转中耕——不够70万条秧全部拔掉补插》。那时候，全县提出每亩要插60万条秧，其密度可想而知；二是盲目宣传推广各种积制肥经验，甚至认为屎缸粉和墙坭也肥效大，盲目推广用屎缸粉和墙坭作肥料，大打屎缸和大拆坭墙（分别见《中山日报》9月23日、25日报道）；三是在宣传深耕改土中不因地制宜，违反科学。宣传要深翻土地一尺至一尺五寸，认为这是密植的基础，高产的保证。在工具改革中，也有盲目宣传推广某些项目而造成浪费的现象。

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鼓动“打擂台”、“闹竞赛”活动，为“大跃进”鸣锣开道。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批判“右倾保守”、“中游”等思想，提倡“插红旗”、拔白旗，就成为“大跃进”的思想先导，是这一时期宣传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当时，宣传工作一个惯用方法是动辄开展大鸣、大放、

大辩论、大字报。报纸宣传往往抓住一些所谓反面典型(其实是正确的代表),在报上开辟专栏进行讨论(确切些说是辩论、批判),以清除运动的“阻力”。早在二月中旬,《中山报》便发动群众在报上批判万顷沙乡技术站站长李广赞报出的“不能过早春播”的观点。有的文章说他是“生产大跃进中的爬行者”,有的说他是“促退派”,有的说他是“必须搬掉的大跃进中的绊脚石”。

这种辩论和批判有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农事季节的变化或政治需要而退择典型人物和确定批判的重点内容。时值“双夏”大忙季节,《中山日报》从7月27日至29日一连几天,发动了对已受处分的甘成基、黄康胜和叶满八等人的批判。甘原是中共北溪乡深湾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报道主要指责他对党委关于直播的决定阳奉阴违,是党内的促退派;黄原是神湾乡党委委员,报道主要评击他对补播、点播和插秧的要求思想抵触,强调诸多困难,不执行党委的决议;叶原是神湾乡神湾农业社的党支部副书记,报道主要批判他在会上表示拥护党委关于补播的决定,但会后不坚决贯彻执行,和黄一样是党内的阳奉阴违分子。中耕时节,为了坚决攻破禾苗分蘖200万穗大关和清灭三类落后禾苗,9月1日起,连续数天开展对濠头乡技术批广站技术员陈卓南之“禾苗定局论”的批判。在人民公社建立后,10月18日,为了发扬“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帮,耕命苦战,不计报酬的可歌可泣共产主义风格”,又开展了对李曹珍、高镜钊和吕胜光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错误思想”的批判;同时号召学习何锦康的忘

我劳动精神。此后，又以所谓晚造“空前大丰收”的“事实”根据，大批特批“秋后算账派”。

报纸一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等思想；另一方面，鼓动开展创高产、插秧、割禾、积肥、深耕改土、养猪等“打擂台”、“闹竞赛”活动。在这类活动中，华而不实的口号满天飞。还在上半年，互送大字报进行竞赛挑战的消息就已不时见诸报端。7月23日，县委提出“超新会、赛番禺、赶潮安”的号召前后，这种活动更是搞得热火朝天，《中山日报》对此频频进行了报道。例如：7月4日，报道万顷沙乡《新安社决心当高产“状元”——晚造试验田亩产稻谷10530斤》。社论号召要“赛过全县，超过全省，跨过长江，飞上北京”。7月9日，报道《压阳江 赛望城 全国列上游——张家边乡今年养猪30万头——上半年平均每户养猪14头，每人养猪4头多》。7月17日，报道《万家灯火通宵亮 人人苦战在田间——民众乡插秧浪潮滚滚翻》，《横栏乡猛战港口 立秋前五夭播完秧》，《全部民田大暑前一天插完——张家边乡向各民田乡、社提出挑战》。社论：《到处找对手 到处设擂台》。7月23日，报道《实现“五万”、“七千”，拿全县、全省、全球第一——中共永宁工委会向全县工委、乡党委提出友谊竞赛》。7月30日，报道记者写的通讯《陈带好插擂台》，说的是港口乡民主社姑娘陈带好，年方19未嫁人，劳动生产人人夸，千起活来男子汉赛不过她。夏种期间，她自设擂台，提出具体条件，要同队里的男子汉开展插秧竞赛，说：如果谁能突破日插二亩半，她愿将终身许配他。结果引来了几个男青年和娘苦战了一整天，但谁也没有突破她提出的定

额要求，最后只好作罢。

三、连续报道放高产“卫星”，大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高调，给欺、假、浮潮推波助澜。

农业生产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发动，一番又一番的催耕催种，接着便到了收获季节。从夏收开始，全国和本地农业高产“卫星”的消息便陆续反映到《中山日报》的版面上来。其中水稻亩产从一千多斤、几千斤、超万斤地不断飙升。例如：11月25日才报道过《水稻“卫星”越放越大——新乡一块田亩产6604斤——濠冲7.4亩地亩产5370斤》；第二天，又报道《我县水稻大“卫星”腾空飞舞——沙涌试验田亩产12756斤》，同时配发领导干部与社员一起割禾、过秤、检查团验收等照片和《祝万斤“卫星”上天》的社论。社论称：万斤“卫星”上天事实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我们只要大胆地想大胆地干，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实际不可能达到的亩产量，竟会成为“现实”呢？后来才知道，这些所谓高产“卫星”，一是按密植株数和固定的穗粒数及千粒重推算出来的，二是把其他田地里许多已经或接近或熟的农作物移植合并到另一块田地里，加上收获过称和统计的“按术”处理，以偷龙转凤的方法假造出来的。由于高产“卫星”越放越多，超放越高，使人们误以为粮食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了。有一首诗歌写道：“鲜花盛放红似火，万里稻海翻金波。割禾机器穿梭走，人人喜唱丰收歌。……唱得算账派低头，唱得人人笑呵呵。唱得谷山天戳破，唱得公社幸福多。”又一首写道：“秋收处处闹不休，人群纷在稻海浮。禾镰挥舞

如闪电，转眼田净稻浪收。满田禾桶一行行，越打越多喜如狂。车船箩一运不尽，明年粮食用天装。”这虽是文艺夸张手法，但确实活灵活现地描绘出当时一些领导干部对粮食问题的盲目乐观情绪。后来发觉粮食紧张，就归咎基层干部“隐瞒产量”。

深耕改土是农业生产的另一个“卫星”，也是越放越大。10月25日，《中山日报》报道《我县深耕改土卫星一步登天——19万大军一天深耕改土12万多亩》。这是全县晚造的第一颗“卫星”。此后，继续报道了一颗接一颗的深耕改土“卫星”：第二颗25万亩，第三颗35万多亩，第四颗64万亩……



张家边公社张家边营的社员在深耕改土，准备放“卫星”。

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宣传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例如：10月14日，《中山日报》报道《县第二钢铁厂放炼

铁“卫星”——一条炉不到四天出铁13464斤》、10月17日，报道《“小土群”大显神通 铁卫星凌空直上——我县日产铁突破30吨大关》。11月3日，报道《钢铁战线捷报频传——我县千吨卫星上天》。11月22日，报道全县连续发射了三个炼铁大“卫星”后，这一天又放出了第一颗产钢457吨的钢“卫星”。如此等等。其实，多数土高炉炼出来的铁是无用的炉渣铁，这些钢铁“卫星”和农业高产“卫星”一样，有着明显的浮夸虚报成份。



为大炼钢铁收购原材料

四、鼓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欢呼共产主义将临，为“共产风”呐喊助威。

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在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之下，8月间，全县迅速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以后一段时间，宣传人民公社又成为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宣传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始终推崇极“左”思潮，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例如：《中山日报》于8月16日刊登图片和报喜信，欢庆人民公社的诞

生。通栏大标题是：《全县人民向共产主义直奔》，《人人向往共产主义，公社处处建成》。社论：《全县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8月31日，报道全县建成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组成大家庭——全县80万人民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社论：《欢呼全县人民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祝贺我县各乡（镇）胜利地建成人民公社》。同日还报道了两则消息：《向全县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迈进》，《共产主义事业全面开花——全县手工业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接着，又宣传《挖毒根 人人憎恨私有制存在；割尾巴 生产资料无偿地归社》。这些宣传，连同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风格的宣传，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否定了等价交换和互利的原则，刮起了“共产风”。



石岐市水上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及报喜实况

在宣传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同样存在着“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问题。供给制

是指大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还实行“七包”、“八包”、“十包”等。例如：张家边公社实行“八包”：包伙食、学费、生育补养、丧葬费、理发、看戏、医药和假日船车来往。后来虽然缩小了包的范围，但吃饭继续不要钱。工资制是指给每个劳动力按月发放工资。关于这方面，《中山日报》曾大力宣传推广过张家边等公社办好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经验。11月19日刊登的《张家边是乐园》这首诗歌，就是这种分配制度的形象写照：“人民公社张家边，就是人间的乐园。粮食实行供给制，三餐干饭不要钱。老人喜进幸福院，幼儿送入幼稚园。有病医疗全免费，孕妇也有留产院。月月都有工资发，食饱穿暖有余钱。千年理想已实现，人人干劲大过天。千座高炉土地建，钢铁滚滚似河川。遍野金黄谷增产，个个谷堆顶破天。”



张家边公社七营四连公共食堂正在开膳

五、宣传部门的竞赛活动，加速了宣传工作的“大跃进”。

下面，我们再从宣传工作本身“大跃进”的角度，看一看它的炽热程度。

上半年，在宣传工作“大跃进”中被评为全县冠军的坦洲乡，继向佛山专区各乡发起宣传工作竞赛挑战后，在乡内社与社之间也开展了宣传工作竞赛活动，从组织部署、宣传形式、标新立异等方面，互相攀比争冠军。各社普遍成立宣教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定出汇报和研究工作制度。宣传队由1300个扩大到1857个。宣传形式有参观评比、工地辩论、读报、演唱、演剧、土广播、大字报、快报、标语、党团员到技术学校上政治课等20多种。

在下半年深耕政土中，全县共搭牌楼208个，组织了105000个宣传员、1447个宣传队、10部宣传车在公路沿线各个深改区展开宣传，将20个广播站搬到田间进行广播，写了27万多首诗歌和85万张大字报，还组织了200多个歌舞团、文工团到田间慰问演出。工地上设有“英雄台”、“进度台”、“献计台”、“辩论台”，随时表扬好人好事和开展辩论、批判。总计宣传形式有26种之多。三乡公社在深政宣传中实行“八到田”：宣传工具到田；中、小学生上课到田；文娱队到田；广播站搬到田；电影队到田；收音机到田；图书到田；舞狮子到田。同时，全县组织了58个展览会、62万人次参观。小榄公社运用高产“卫星”实物搭宣传牌楼，以蚕茧作字，甘蔗作柱，南瓜作灯笼，宣传和展览并用。黄圃公社在墙上写标语，在鱼塘里用浮萍并成字样，用禾秆扎成